

# 不要把意识形态引进中国企业改革

专访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包明华

■ 本报记者 宋江云/文

如今的舆论对于国企改革,似乎有些苛刻。不管企业兼并还是出于正常的市场行为还是政策所迫,只要出现国企兼并民企的案例,就会被部分媒体和专家扣上“国进民退”的帽子,个案鼓吹成趋势也在所难免,而这些舆论也让国企的决策层如履薄冰。本是正常市场现象的兼并重组,却总能引来颇多争议。就这一现象,《中国企业报》记者专访了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包明华,他认为应该客观理性地看待企业的兼并重组。

## 兼并重组是资源的优化配置

《中国企业报》:兼并重组是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应该如何正确理解?

包明华:生产力的发展导致生产的社会化,生产的社会化客观要求生产资料占有和使用的社会化,而生产资料占有和使用的社会化会导致企业的规模越来越大,行业的垄断程度越来越高。美国飞机制造业被波音一家企业垄断,汽车制造业基本被福特、通用、克莱斯勒三家汽车公司垄断。企业资产利益的膨胀,要求企业规模越来越大,进而要求生产资料占有和使用的社会化程度越来越高,最后的结果就是导致生产规模越来越大,行业的垄断程度越来越高。

企业规模从小发展到大规模主要通过两种方式来完成。一种是自己扩张,通过投资,然后扩大企业的生产规模;另外一种就是兼并。

劣势企业的资源配置是低效,优势企业的资源配置是高效的,优势企业把劣势企业吃掉,就等于说把资源从低效配置状态转换成高效配置状态。投资经营一个企业,首先要搞一个计划,然后要报批、要立项,立项以后还有一个建设周期,然后就是生产。一个项目没有三到五年肯定干不了,购并的话,可能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五个月就能完成。

著名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勒说,几乎世界上所有的大型公司,它的规模扩张都是要经过企业并购来完成。企业并购,可以说是整个世界经济、人类经济发展的一个必然挑战。

《中国企业报》:兼并重组是一种快速的优化资源配置的形式,然而,也有观点认为,兼并重组达到一定程度,它会陷入到垄断阶段,它们之间有没有一个临界点?

包明华:有临界点,美国有三个反垄断法,一个企业购并另一个企业会不会形成垄断,这个垄断社会是不是可以容忍,可以通过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也叫H指数来衡量,这一指数是反映市场集中度的综合指标,美国有一个临界点,欧



国内大型国有钢铁企业兼并规模较小的企业,有利于钢铁企业做大做强。 CNS 供图

盟也有个临界点。企业购并,折算成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后,如果超过临界点的话,它就违反了反垄断法。在欧盟、美国,反垄断法都是定量化,它的标准就是1加1等于2,2就是临界点,2.1都不行,它是有非常严格的界限的。

《中国企业报》:我国有没有类似的量化标准呢?

包明华:中国目前对企业购并没有量化标准,比如可口可乐收购汇源果汁,商务部说它是垄断就是垄断,是一个主观标准,还没有一个客观的量化标准。

但我国的企业购并每个步骤、每个行为都有法律约束,主要是《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三大法律约束规范企业购并。企业购并的每一个步骤、每一个行为都有法律在约束他,比如说价格的规定至少有两项原则,购并必须在60天内完成,规定了就不能超过这个期限。

## 不要把意识形态引进到中国企业的改革

《中国企业报》:对于引发争议的山东钢铁兼并重组日照钢铁,您怎么看?

包明华:这个需要讲一下背景,全球三大铁矿石企业——巴西的淡水河谷公司、英国的力拓和澳大利亚的必和必拓垄断了世界铁矿石的供给。垄断的目的在于,这三大铁矿石公司看中国是世界铁矿石的进口大国,也是钢铁出口大国,但中国钢铁公司比较分散,在进行铁矿石的议价时意见不统一,外国出口公司就是抓住中国钢铁公司这一弱点提高价格,从而剥夺中国钢铁企

业的利润。在铁矿石进口方面,我们没有定价权。我们要改变这种状况,在战略性资源的供给和购并交易过程中提高话语权,尽可能地掌握世界战略性经济资源公司的股权,通过企业购并的方式把它控制住,掌握了控股权就等于把公司本身控制住了。

日本人在铁矿石的贸易当中为什么他们的话语权比较大呢?就是因为日本钢铁行业的垄断,垄断程度非常高,在铁矿石进口的谈判过程中,话语权就越大。国内大型国有钢铁企业兼并规模较小的企业,有利于钢铁企业做大做强。

《中国企业报》:但也有舆论认为,山东钢铁兼并日照钢铁,是国进民退,这个论点站得住脚吗?

包明华:如果国有企业的效益高于民营企业,为什么不把这个事情交给效益高的国有企业做呢?不要把意识形态引进到中国企业的改革。我们只看哪一种经营模式的资源配置更加有利于提高社会资源配置效率,更加有利于优化经济结构资源,我们就选择谁。

在企业购并过程中,一般来讲是效益高的企业去并购效益低的企业。如果效益低的企业购并了效益高的企业,等于把资源配置从高效状态变为低效状态,这是不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所以成功的企业购并一定是资源配置通过购并的方式转换成高效配置状态,否则,就是失败的。

《中国企业报》:中国航空公司收购一些中小型民营航空公司,国航收购深航、东星航空,有舆论认为这是“野蛮的收购”,您怎么看?

包明华:市场经济就是要鼓励竞争,优胜劣汰,在生产领域不讲公

平,在分配领域要讲公平,要讲人品。

《中国企业报》:有数据显示,从2001年到2011年,中国企业并购的金额跟并购的案例都呈现一个上升的趋势,您是怎么解读的?它们说明了什么?

包明华:购并呈现上升趋势,说明发展的优胜劣汰。企业在发展的过程中,有竞争就会有优胜劣汰。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路径,优质企业兼并劣质企业,把资源配置从低效状态转换成高效状态,这就是市场化。

《中国企业报》:兼并重组是否有利于国民经济的发展,有利于经济的市场化?

包明华:这是肯定的,经济的市场化程度越高,市场经济就越完善。企业并购的发展规模和速度,是中国经济市场化的一个重要风向标。

《中国企业报》:在兼并重组的过程中有哪些问题需要注意呢?

包明华:一是,国有企业在转让时候,应该按照国际通行的企业价值评估标准,防止国有资产流失。二是,不能偏向并购,政策法规应该引导优质企业去兼并劣质企业,不要反过来,劣质企业去兼并优质企业,导致资源的优质配置变成低效配置,整个经济效率没提高反而降低了,这种情况就是逆购或负购并。国进民退只有在国有企业效益低于民营企业的情况下,才可以。三是,企业购并,是非常复杂的,它牵涉到很多问题,比如购并效益的测度。四是,我们的企业购并一定要按市场规律办事,不要把非市场因素掺杂进去,不要把政治因素掺杂进去。

《中国企业报》:应该采取哪些措施来尽力避免上述问题呢?

包明华:应加强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购并的监管,从程序、制度上避免暗箱操作,合谋交易,用制度来规范它。

## 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领域都应垄断

《中国企业报》:哪些行业应该由国家垄断经营呢?

包明华:按照我的想法,凡是关系到国民经济命脉的企业,一定要提高它的发展规模,提高它的垄断程度。

《中国企业报》:中国企业在外国兼并遭到阻止或者安全审查,是否有悖于市场经济的原则?

包明华:中国华为收购美国3Com公司,并没有违反美国的反垄断法,但美国就是不批准,他们认为3Com公司掌握了美国重要的政治和经济资源,所以不管它有没有违反美国的国务院法,美国就是不允许华为收购3Com公司。

《中国企业报》:这种现象背后说明了国家利益的斗争吗?

包明华:是的,可以这样理解。

《中国企业报》:在国进民退的观点上,经济学家郎咸平与张维迎教授分别持不同观点,您怎么看两位经济学家观点上的不同?

包明华:首先,我要说,不要迷信所谓的权威。

第二,在经济学家当中,很多都是支持西方观点的,语言还是外国的语言,这是错误的。郎咸平教授很了不起,但实际上他对中国的经济根本就不懂,有些观点是错误的,他认为国有企业的效益远远高于民营企业,既然效益那么高,为什么国企还要改革呢?他认为国有企业的引导者,政府的宏观调控,想通过国有企业的改革来侵吞人民的财富,侵吞国有资产。严格讲,他不了解中国,不了解国有企业,他在实证分析,用事实说话方面是欠缺的,我看不懂他写的报告。

张维迎教授对中国实体经济的研究,或者中国经济的实证研究是不够的。他的贡献在于他是中国系统阐述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第一人。

《中国企业报》:国进民退与“优胜劣汰”,您是怎么看呢?

包明华:这个以资源配置、效益优先,如果国有企业在某领域资源配置效益低于之前,那么它就应该退出;如果国有企业的资源配置效益高于民营企业,那么就国进。当然,还有一部分是民营企业不应该进入的领域,像军工企业等国有垄断行业。国有企业在什么地方存在,第一应该是在民营企业不愿意经营的领域;第二,在民营企业不愿意经营;第三是民营企业没有办法经营的地方,比如航天领域。



# 构建与完善产业安全预警机制

专访北京交通大学中国产业安全研究中心主任、博导李孟刚教授

■ 本报记者 李志勃/文

外资扩张与产业安全总是如影随形。为了预防产业安全受到外资威胁,目前国际上很多国家都已经建立了本国的产业安全预警机制。相比之下,我国在这方面还处于探索阶段。外资强势扩张下,我国的产业是否安全?产业的安全与否怎样判定?如何构建与完善我国的产业安全预警机制?带着这些问题,本报记者专访了北京交通大学中国产业安全研究中心主任、博导李孟刚教授。

《中国企业报》:中国产业安全研究中心非常重视研究我国产业控制力与产业安全的问题,请您阐述一下相关的概念。

李孟刚:产业安全是指自主产业的生存和发展不受威胁的状态,包括生存安全与发展安全两个层面。产业控制力是产业安全的基本观点,其核心是强调本国资本对本国产业的控制能力。基于产业控制力的产业安全观,一方面,主张东道国的产业发展需要国外资金的支

持;另一方面,强调要防止跨国公司对东道国经济和产业命脉实行控制,危害其经济自主和健康发展,进而危及国家安全。

目前,国内外对产业控制力的评价标准不一。在研判产业控制力时,主要应从东道国资本对产业的市场、品牌、股权、技术及重要企业的控制率等方面考察,或反过来分析外资在上述方面对产业的控制可能带来的风险和损害程度。如制造业产业的核心技术被外资控制后,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我国国内开发新技术的积极性,使我国与他国间的技术差距逐渐加大;大豆等农产品的生产、销售被外资(尤其是国际热钱)控制后,会造成食用油等生活必需品价格波动,影响人民生活与社会安定;信用评级市场被外资控制后,会导致我国金融企业资产价值被低估,甚至失去国际金融话语权。

《中国企业报》:中心这两年发表了我国产业外资控制与产业安全的多个报告,根据中心的研究,外资对我国产业控制的现状如何?

李孟刚:外资不仅仅是一个资金的概念,它还是技术、品牌、标准、经营管理、全球生产经营和销售网络、信息和现代服务的载体。我们的研究主要从外资市场控制度、股权控制度、技术控制度、总资产控制度和固定资产投资控制度等方面,对近年来我国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及重点产业的外资控制变化趋势进行了分析。

第一产业虽然所利用的外资绝对量非常少,在全国利用外资总额中的比例不超过2%,但近年来增速比较快,从1999年到2009年翻了一番。

外资对第二产业的控制率较高,我国产业安全面临一定威胁。外资占我国工业市场的平均份额接近1/3,超过了国际标准值。在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等细分行业中,外资对采矿业和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的控制程度较低,也比较稳定;但制造业外资控制程度很高,市场控制度、股权控制程度、专利控制程度、研发控制程度、新产品产值控制度

等指标基本都在30%左右。

第三产业总体实际使用外资的金额逐年提高,占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的比例从2004年的23.17%提高到2009年的41.79%,第三产业正逐渐成为外资进入的热点。

《中国企业报》:如何判定我国的产业安全受到威胁及其程度?有哪些指标可以衡量?

李孟刚:衡量一个产业是否安全,既可以直接评价其安全度,也可以从产业不安全的状态进行反推。从系统科学的角度看,产业呈现出安全或不安全的状态以及产业安全度的变化,是多种影响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

一般而言,判定产业安全度可以从产业国内环境、产业国际竞争力、产业对外依存度、产业控制力等方面进行评价。其中,产业国内环境指标又可以进一步细分为产业金融、生产要素、市场需求、产业政策等环境的二级指标,产业国际竞争力指标可以分解为产业国际市场占有率、国内市场占有率、产业国际竞争力指数、产业研发费用、产业集中

度等二级指标,产业对外依存度指标可以细分为产业出口对外依存度、产业进口对外依存度、产业资本对外依存度、产业技术对外依存度等指标,产业控制力指标可以分解为产业市场控制度、产业股权控制度、产业专利控制度、产业研发控制度、产业新产品产值控制度、产业总资产控制度等。

值得说明的是,由于不同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不同、技术经济特点不同、发展阶段不同,影响产业安全度的因素也各不相同。因此,产业安全的具体指标及测算方法,需要结合具体产业的特性给出。

《中国企业报》:您建议要建立我国的产业安全管理与预警机制,请介绍一下这个机制如何建立?

李孟刚:一套行之有效的产业安全预警机制包括预警指标体系的构建、预警界限的确定、预警结果的输出和预警系统的执行。产业安全预警系统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选择和构建一套能够全面、动态、及时反映产业发展状况和趋势指标体系。指标的选取不是固定不变的,

而是随着经济形势的不断变化和运行经验的不断积累而“与时俱进”,逐步修改和完善。预警系统能够发挥作用其中一项关键工作就是指标预警界限的确定。界限值的确定可以采用专家评定法和历史数据法等进行确定。产业安全预警系统最后一项工作就是预警结果的输出。预警系统运行效果的评价直接由预警结果的输出来体现,若预警结果的输出不能满足决策者的需要,仅会影响决策的制定,甚至会导致决策失误。

目前国际上比较常见的模式有:单一监管模式、双轨多元模式和单轨多元模式。其中,“三位一体”的单轨多元预警执行系统包括三个层级:第一级是国家级,由政府出面建立的官方预警机构;第二级是产业级,由行业自主建立各自的行业协会,并且由行业协会发挥搜寻信息,执行预警监督职能;第三级是企业级,企业自身也要建立相关的预警职能机构,或者将这项职能赋予其他部门,如市场调研部等。